

# 《大日本史》中的中国要素

邢 永 凤

在国与国相互认识的形成问题上，国家史书由于其重要的地位和教化作用，在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认识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史书中的对外认识、相互认识是揭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的重要途径。

《大日本史》是日本历史上记述日本历史最为详尽、也是编撰时间最长的史书，是日本的正史之一。同时，其中的历史认识、对外认识等对日本后世的影响又首屈一指。日本明治维新，日本现代化的进程，都可见《大日本史》中的“尊王思想”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也都与《大日本史》有着很深的渊源。可以说，大日本史中的中国要素，是这部史书的重要特点。但目前为止，国内对于《大日本史》的研究寥寥无几。<sup>①</sup> 鉴于此，本文将从日本史料中探讨此书的编纂契机、编撰过程中中国要素，以期从日本的史书中解读中日关系的渊源问题。

## 一、《大日本史》的编撰与《史记》

《大日本史》是汉文体的日本国史。最早由德川光国召集众史家，经过几代人对日本古今的全方位调查和严格考证，历经200多年编撰而成。该书始自神武天皇，止于南北朝末期的后小松天皇。是日本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史书。这部史书的重要性在于不但不给后来的日本民族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且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也多将这部史书视为给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注入思想和动力的巨作，并从中提炼出极大的历史意义和近代价值。<sup>②</sup> 而这样一部在日本历史上被赋予了极大的历史意义的史书的编撰者是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德川光国亦称源光国（1628-1700），他是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的孙子、第四代幕府将军德川家纲的叔父，其水户藩与纪伊、尾张一起共称“御三家”，是江户时代德川家的三大亲藩之一。在江户时代地位举足轻重。那德川光国作为“御三家”的藩主，他是如何要编撰史书的？他编撰《大日本史》的目的何在？

关于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契机及目的，日本学者多有论述，如：名越时正：《大日本史与义公—其史观的发展过程》（国书刊行会，1998年）；吉田俊纯：《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的目的》（《后期水户学研究序说》，本帮书籍，1986年）；吉田俊纯，《水户光国的时代—水户学的源流》（校仓书房，2000年）等。吉田的一系列著述中，都认为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的契机在于其自身难以摆脱的矛盾，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圣人的美名<sup>③</sup>。而另一学者名越时正则认为，从德川光国毕生都将大日本史称为“本朝史记”，足以证明他是有感于《史记》“不有载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

见。不由史笔，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而发修史之志<sup>④</sup>。另外，野口武彦所著的《德川光国》（朝日新闻社，1976年）中，也认为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的动机是源于读《史记》的伯夷传<sup>⑤</sup>。

国内关于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的研究仅限于周一良先生的一篇论著，但其中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此，笔者欲从相关史料中，考察德川光国编纂此书的契机，以及其目的所在。

德川光国作为的水户藩藩主，在日本历史上不仅是一位“名君”，他的治理藩政的事迹，在日本流传甚广的“水户黄门”中可见一般。同时，水户藩作为“御三家”之一拥有德川时代“天下副将军”之称，在江户时代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他的重要性更在于他将毕生事业——编纂《大日本史》。关于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一事，第三代藩主源纲条在《大日本史》序中这样写道：

先人十八岁读伯夷传，蹶然有慕其高义，抚卷叹曰：不有载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见。不由史笔，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于是乎慨焉立修史之志。上据实录，下采集私史，遍搜名山之逸典，博索百家之秘记，缀缉数十年勒成一书<sup>⑥</sup>。

光国的后代们，认为自己的祖辈修史的主要契机在于读伯夷传的感动，从而触发编史之志。因此，从其后辈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史记》对于德川光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从德川光国相关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德川光国对于《史记》尊崇备至，耳熟能详，对于其中的内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下面一则史料中写道：

司马迁史记，诚为史家之矜式，然有不为忠臣义士立传者，殊为可惜。如汉纪信目焚而代高祖之死，。。。。何不为之立传乎<sup>⑦</sup>？

此外，关于德川光国与《史记》的关系，以及他修史的志向在德川光国写与居于京都的公卿藤原公规的书信中亦有所表露：“某自壮岁发奋立志，欲编修本朝之史记，每苦载籍不备，别目所录，皆可以资史记考据者”<sup>⑧</sup>。

据此可以得出，德川光国想要编纂的正是“本朝之史记”，他一生都将其称为“本朝史记”。可见，对于德川光国而言，中国的《史记》，让他知道了“义”，更让他感叹史书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他修史的契机，在于读《史记》。这一点，参与修史工作的史臣记载也可以说明。

曾在史馆——彰考馆长期参与《大日本史》编撰的史臣田中犀所作的《开彰考馆记》中，对其编写大日本史的缘由有如下记述：

夫史者所以记治乱、陈善恶、用备劝惩之典者也。故在异朝则班马以来作者不乏，世世蝇蝇历历成堆，本帮自上古及中叶，独有正史实录，而昌泰以后寥寥无闻，可以憾焉。我相公（是史臣们对德川光国的尊称）尝叹之，构馆于别庄，命诸儒臣广稽载籍，上自神武下迄近世，作纪立

传，效班马之遗风以撰倭史，有年于兹，其欲记治乱，陈善恶、用备劝惩之典之志可以见焉<sup>⑨</sup>。

中国在司马迁、班固之后，史书不绝于世，而日本在近世没有史书，这让德川光国特别遗憾，于是便效仿中国的司马迁、班固的撰史书的精神编撰自神武天皇到近世日本的史书，以记载治乱之事，起到劝善惩恶之目的。这其中，明确说明了在此书编撰中中国因素的影响。这也与德川光国在读《史记》后：“不有载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见。不由史笔，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的感叹如出一辙，可以说，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契机在于读《史记》的启发与感叹。

另外，从时间上推算，在正保三年（1647年）德川光国便派遣史臣人见卜幽去京都收集史料年份，正是其读史记而有所感后，其行动也足以证明此事的可信性。<sup>⑩</sup>更为重要的是，《史记》对于德川光国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使其有修史之志，更在于伯夷叔齐对于德川光国的感化。

先人十八岁读伯夷传，蹶然有慕其高义，抚卷叹曰：不有载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见。不由史笔，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于是乎慨焉立修史之志<sup>⑪</sup>。

可以说，《史记》中记载的伯夷叔齐传给德川光国触动最深，德川“慕其高义”，伯夷叔齐的高义，才有了以史笔记载让后人观感的冲动。伯夷叔齐有着怎样的“高义”，他们的“高义”对于德川光国有着怎样的意义？先从《史记》中的记载考察。伯夷传是《史记》列传中的内容。《史记》这样记述道：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sup>⑫</sup>。

此记载中主要有三点内容：一是关于继承王位，兄弟二人互让之事。二是关于文王伐纣的谏言；三是饿死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之事。能让德川光国感叹的，在他的亲身经历，与伯夷叔齐有着类似的经历，那便“德川光国幼年时越二兄而为父后，及长不自安，乃使兄子袭爵”。

德川光国在袭任水户藩藩主问题上却于伯夷叔齐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光国是承父命越其兄而成为“世子”，继而担任藩主，而为此，他多次为此而苦恼，在中年后将藩主职位让于其兄长之子。为此，他一生不嗣。德川光国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修史和如何让位。

尤其是在“推让”问题上，光国曾经多次言到：直到63岁实现了其让位于兄长之子德川纲条的愿望，他一天都没有心安理得。对于他而言，让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而让其决心让位的，正是《史记》中的伯夷叔齐的“高义”之举。正是《史记》的记载，让光国有机会读到伯夷叔齐传，这也是让德川光国“不有载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见。不由史笔，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的真实感受，因此，他的感叹是有感而发，他的修史之志也是由衷的。《史记》的记载，使光国有机会终其毕生而要完成“大义”之举，也让光国及其后代持续200年完成了日本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史书。可见，《史记》给予德川光国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从其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伯夷叔齐传带给他的影响和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以至于在多年后，光国而多次谈及此事。伯夷叔齐的大义之举使他深受感动，这也许影响了他的让位之举。

德川光国一生中，两件大事之一的让位，便是其读《史记》伯夷传所受到的震撼，而这种震撼便是伯夷叔齐所拥有的“大义”。追求大义，也是德川光国一生奋斗的目标，也是其一生的实践也在于完成此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在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动机上，《史记》给予其影响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德川光国的修史事业源于读《史记》的震撼，而其修史过程中与中国人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人便是朱舜水。

## 二、德川光国与朱舜水

德川光国在承袭水户藩主之后，于明历3年（1657年）在江户驹込别墅设彰考馆，广招人才。恰在此时，朱舜水来到了日本，1665年，德川光国派小宅顺生赴长崎“采访硕德耆儒”，随面见了朱舜水，关于此事，《朱舜水先生行实》中记载道：

生顺屡诣先生谈论古今。谓先生曰：东武（指江户）若有奉先生为师者，能东游否？先生曰：兴学设教是国家大典，而在贵国更为重，我深有望于贵国。但以我才德菲薄，何遵足为庠序之师？至若招我，不论禄而论礼，恐今日未易轻言也，惟看其意何如耳。及顺归，上公备闻先生才德文行，明年乙巳稟明公廷聘召先生。先生乃于译者及门人议其去就，皆曰：上公好嗜学，特招先生，不可违拒。先生乃应其聘<sup>⑧</sup>。

德川光国有在水户藩兴儒学、设校之愿，力图学习明朝的儒家礼仪，便力邀朱舜水来水户藩。朱舜水欣然前往。此后便开始了在水户藩弘扬儒学的生涯，在水户藩，为德川光国编制了《学官图说》，并为水户藩儒士讲解“释奠之礼”。为水户藩的儒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朱舜水去世后，德川光国将其葬于家族墓地内，并在别墅为朱舜水设祠堂，每年的忌日为其举行祭祀。而朱舜水在被德川光国聘请至水户藩之前，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他自身特殊的经历，又反映在他对大日本史的编纂的影响上。

朱舜水（1600-1682），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才学出众，初有报国之志，但不满明末的黑暗与腐败，曾经12次拒绝明政府的出仕要求，决心隐居，一心向学。但当清军入关后，他弃笔从军，参加了郑成功的反清斗争，为支持南明政府，他三渡安南，七渡日本寻求海外援助，之后又亲历了郑成功的北伐斗争。南明诸朝廷灭亡后，他坚决“不食清粟”，亡命日本，仍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无论生活怎样的艰难，他都坚持只著明代衣冠，流亡日本23年，始终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在临终前，他拿出自己的毕生积蓄3000金，嘱托要用于复明大业<sup>④</sup>。对自己的境遇，朱舜水曾写道：“孤臣饮泣十七载，鸡骨支离，十年呕血，形容毁瘠，面目枯黄，而哭无廷，诚无所格”<sup>⑤</sup>。充分表达了寄人篱下的悲惨境遇和无主无家无国的悲哀。朱舜水这样的气节，正是《史记》中伯夷叔齐的“大义”之一。这亦正是德川光国对其倍加敬重的原因所在，在其给朱舜水的祭文中便可以看出：

呜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裕，生于明季之衰，遭于阳九之厄。危行抵节，屯蹇隐居，鹤书连征，确乎不拔。身陷贼窟，守正不移，流离转蓬，经几年所。衣冠慕7古，未曾变夷，欧血尝胆，至诚无息，强光肥汤，谢恩远辞。鼓翼南溟，奋麟东海，风婴雪虐，义气益坚<sup>⑥</sup>。

对于朱舜水的这样的气节，这般的大义，曾有日本人赞道：“先生以逋臣客轨，执意自高，不为馨折，死亡不顾，言夺其争，铮铮铁面，。。。。使荒裔知有凛凛大节，不因国破，全斯中外高风，可称古今第一帜”<sup>⑦</sup>。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其气节的高度赞扬。也正因为如此，在水户藩，德川光国对朱水顺执弟子之礼，而之后几任成为彰考馆总裁的也都是朱舜水的弟子。

另一方面，朱舜水对德川光国的礼遇以及德川光国本人都有着极高的评价，在朱舜水与其在中国的兄长陈遵之的信中，这样评价德川光国：

弟漂流无已时，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国之禁，三十余年不留唐人。留弟乃异数也。去年六月，应宰相源相公之招，来至江户。极蒙优礼。在日本国共诧以为未尝经见之事。上公乃为当今之至亲尊属。封建大国。列为三家。盛德仁武。聪明博雅。从谏弗拂古今罕有。弟处宾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廩饩。深用为愧。上公让国一事，为之而泯然无迹。真是大手段。旧称泰伯夷齐为至德。然为之而有其迹。尚未是敌手。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如若此人君，而生于中国，而佐之于明贤硕辅。何难立致雍熙之理。世子亦能仰体尊义，近更婉曲绸缪<sup>⑧</sup>。

这封信件描述了朱舜水留于水户藩的渊源及其对德川光国的高度评价。一是认为光国盛德仁武，是一代明君；二是对于其与自己的关系方面，对于朱舜水的立谏都能虚心接受。三是对于德川光国“让国”之举给予了高度赞赏，堪比伯夷叔齐。甚至高于伯夷叔齐。可见，其对其评价之高。可以看

出，朱舜水在国内没有施展的才华，在遇到他所认为的“文学优于五车，德誉满于一代，而汲汲下士，不异姬公”<sup>①</sup>。得明君而辅佐之，是身为封建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与荣誉，因此，朱舜水对德川光国尽全力而辅佐之。“每见谈论，先生援引古意，弥缝规讽，曲尽忠告善之意。”<sup>②</sup>有着极高的评价，同时亦有着热切的期待，他曾将这样写道：

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略）瑜居恒读此书，慨然兴叹曰：吾安得身亲见之哉！然而不能也。兹幸际知遇之隆，私计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为易；唯在勃然奋励，实实举而措之耳<sup>③</sup>。

朱舜水希望朱舜水能够完成近世中国所不能完成的“大道”。可以看出，朱舜水对德川光国有着很高的期待和极大地鼓励，同时，德川光国对于朱舜水也倍加尊敬，“之瑜时有所规谏，公尝嘉纳之”。朱舜水自己也说：“水户上公尊之信之至矣”<sup>④</sup>。之间有着非常深的互信互敬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互敬关系，才有德川光国聘朱舜水为宾师，振兴水户藩的儒学事业，也更有了《大日本史》编撰中，朱舜水的参与。关于他们的关系，正像后人所言：“顺水遇义公而全其节，公得顺水而用其学”<sup>⑤</sup>。德川光国所用的顺水之学，一是水户藩的儒学，一便是《大日本史》的编撰。关于此，留待今后考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德川光国一生中几个重要的事件都与中国有着渊源，而编撰《大日本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正是这个环节中的中国因素，决定了他的一生与中国的关系。

---

<sup>①</sup> 笔者仅见周一良：1998，《大日本史》之史学，《周一良集》第四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sup>②</sup> 尾藤正英：1973年，《水户学的特质》，《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东京，岩波书店。

<sup>③</sup> 德川光国为将藩主职位让与兄长之子，便自己一生不嗣，坚持“义”这是其慕伯夷叔齐之大义而做的决定，但这又与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相矛盾。为此，他十分苦恼，于是决定编辑史书来正名。以期自己能像圣人孔子一样留名后世。吉田俊纯：《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目的——以北朝正统论为中心》，《东京家政学院筑波女子大学纪要》，第2集，1998年。

<sup>④</sup> 具体请参考名越时正，1998年，《大日本史与义公》，《大日本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09页。

<sup>⑤</sup> 野口武彦，1976年，《德川光国》，朝日新闻社，107页。

<sup>⑥</sup> 《大日本史》卷一，1912年序，（该序文的实际执笔者为大井松邻）吉川弘文馆，版。

<sup>⑦</sup> 《大日本史》第17册，《修史始末》上12页。

<sup>⑧</sup> 《大日本史》第17册，《修史始末》上9页。

<sup>⑨</sup> 田中犀《开彰考馆记》，类似的观点藤田幽谷也曾言及。具体可参阅《幽谷先生遗稿送原子简序》。

<sup>⑩</sup> 名越时正，1998年《大日本史与义公》见《大日本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09页。

- ① 《大日本史》卷一，序，（该序文的实际执笔者为大井松邻）吉川弘文馆，1912年版。
- ② 司马迁《史记》卷61，列传1，百纳本。
- ③ 今井弘济、安积觉：《朱舜水先生行实》。
- ④ 闵尔康《碑传集补》卷36。
- ⑤ 朱舜水《阳九述略》。
- ⑥ 《朱舜水行实》。
- ⑦ 《安南供役纪事》，跋。
- ⑧ 朱之瑜：1991年《朱舜水全集》中国书店，，13页。
- ⑨ 《与陈遵之》《遗书文集》卷4
- ⑩ 《朱舜水行实》
- ⑪ 《元旦贺源光国》《朱水顺全集》，41页。
- ⑫ 答奥村庸礼 遗书文集 卷十
- ⑬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35。

#### 参考文献：

- 1、《大日本史》，1912，吉川弘文馆。
- 2、野口武彦，1976年，《德川光国》，朝日新闻社。
- 3、《大日本史的研究》，1998年，国书刊行会。

此文是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日本史书中的中国观研究”的成果之一，同时，该项目获得了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基金的资助。

（邢永凤：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